



中共党史資料

“克什米尔公主号”案件真相
抗战胜利时我与港督代表的一次谈判
追记“一二·一”运动
军事学院八年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编
中 央 档 案 馆

62
总第六十二辑

1997年6月出版

D239
6-50

9858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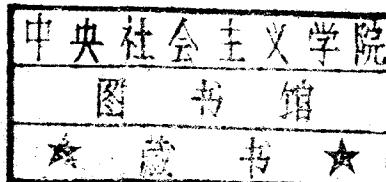
中共党史资料

第六十二辑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编
中央档案馆



200041365



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7年·北京

主 编: 韩泰华

杨公之

副 主 编: 陈 夕

本期责编: 傅 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共党史资料 第 62 辑 /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 - 北京 : 中共
党史出版社 , 1997.5

ISBN 7-80136-083-4

I . 中 … II . 中 … III . 中国共产党 - 党史 - 资料 N . D2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7)第 06306 号

中共党史资料(62辑)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编
中 央 档 案 馆

出版发行:中共党史出版社

通讯处:北京 1929 信箱 邮编:100091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颐和园路 35 号

电话:(010)62581570 传真:(010)62581532

经 销:新 华 书 店

印 刷:北京地质印刷厂

850×1168 毫米 32 开 7 印张 160 千字

1997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199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3000 册

ISBN 7-80136-083-4/K · 73

定 价:6.00 元

DH94/27

目 录

* * * * * 特 约 专 稿 * * * * *

- “克什米尔公主号”案件真相 熊向晖(1)

* * * * * 回 忆 录 * * * * *

- 抗战胜利时我与港督代表的一次谈判 ... 谭天度(55)
追记“一二·一”运动 郑伯克(70)
军事学院八年 萧 克(102)

* * * * * 专 题 资 料 * * * * *

南昌起义军主要领导人、部分参加者

- 脱险行踪考 王玉强(125)
刘邓大军在鲁西南 田浩存(139)
毛泽东与“党政干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 王 骏(144)

人物介绍

- 刘少奇二三事..... 郑超麟(160)
谢子长在陕北的最后岁月 郭洪涛(163)

译文选登

- 1941年日本对苏联的立场 ... 娄杰 左凤荣译(169)

研究动态

- 战后日本中共党史研究五十年评述
(1946—1996)..... 张会才 韩凤琴(186)
- 新书选介..... (200)

封面照片：谭天度同志近照

封底照片：“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

“克什米尔公主号”案件真相

熊向晖

《中共党史资料》第 57 辑刊载的《“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始末》一文，像描述此事的其他作品一样，讹误颇多。但该文首次指出，“我方外交部新闻司副司长熊向晖作为周总理的代表”，与印度总理尼赫鲁的代表高氏同赴香港处理此案，这倒合乎事实。此案发生在 42 年之前，众说纷纭。在香港即将回归祖国之际，作为知情者，特为文披露真相，并藉此缅怀遇难的烈士，鞭鞑谋杀的元凶，揭露港英对蒋特的包庇纵容，特别是宣传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在这一尖锐复杂的政治斗争、外交斗争、情报斗争中所展示的崇高风范。

中国代表团准备参加亚非会议

1955 年 4 月 18 日至 24 日在印尼万隆举行的亚非会议，是由缅甸、锡兰（今斯里兰卡）、印度、印尼和巴基斯坦发起召开的。五国总理在联合公报中阐明亚非会议的目的是：一、促进亚非各国间的亲善和合作与共同的利益；二、讨论与会各国社会、经济与文化问题和关系；三、讨论对亚非国家具有特别利害关系的问题，诸如民族主

权、种族主义及殖民主义的问题；四、讨论亚非国家今天在世界上的地位，以及它们对促进世界和平与合作所能作出的贡献。

1955年1月15日，印尼总理卡斯特罗阿米佐约致函周恩来总理，代表5个发起国政府邀请中国政府派代表团参加。2月10日，周总理复电印尼总理称：“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同意亚非会议的目的，而且对于能够有机会同其他亚非国家一起为这些目的而努力，也感到荣幸”，“决定应邀派遣代表团出席”。

出席亚非会议的共29国。在与会国家中，同我国建交的只有6国（阿富汗、缅甸、印度、印尼、巴基斯坦、越南民主共和国），其余23国大都同蒋帮保持外交关系。美国政府害怕我国参加亚非会议，会前极力挑起一些与会国家对我国的疑惧，散布中国要“夺取亚非世界领导权”的谎言。蒋介石叫嚷现在是“我们外交最危险的时期”，加强在沿海和大陆对我的军事侵扰。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发表关于台湾地区局势的声明，把矛头指向我国，胡说“对世界安全和稳定的眼前威胁集中在亚洲”，煽动亚非会议“谴责以武力实现国家野心”的共产党政权。《印度尼西亚新闻报》早在2月中旬就发表一连串消息，揭露在印尼的蒋帮特务分子正忙于同受到美国援助的印尼武装匪徒取得联系，将对中国代表团采取恐怖行动。印尼报纸还着重披露了蒋帮在印尼的秘密组织“铁血团”的活动。

为了保密，延至中国代表团出发之前，新华社才宣布：国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部长周恩来为中国出席亚非会

议首席代表，国务院副总理陈毅、对外贸易部部长叶季壮、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中国驻印尼大使黄镇为代表。代表团的顾问为廖承志、杨奇清、陈家康、黄华、达浦生。秘书长为王倬如。

经慎重考虑，周总理率中国代表团准备从香港包乘印度国际航空公司（简称印航）C—69型星座式客机飞往印尼。原因是：一、当时我国没有远程飞机，而印航的星座式客机能连续不着陆飞行8小时跨越南中国海。在同我国建交的亚洲国家中，只有印度有这种远程飞机。中印两国政府最先共同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周总理乘印航飞机出席亚非会议，具有政治意义。而香港机场设备优于内地，适于大型飞机起落。二、1954年6月中旬，日内瓦会议关于印度支那停战问题的磋商进入技术阶段，由副手（我国为李克农）参加讨论。苏、美、英、法的首席代表暂时回国。周总理藉此机会率随行人员访问印度、缅甸，乘坐的就是印航星座式飞机“孟加拉公主号”。访问结束后，周总理一行续乘该机飞抵香港，停留1小时，飞往广州。三、印航星座式客机有往来于孟买至香港的定期航班，中间在加尔各答、曼谷起落。我有关单位与印航商妥，在亚非会议前，由我方按印航正常航期，指定从孟买起飞的某一航班，对外照常营业，在加尔各答和曼谷照常上下客货，到香港后临时改为中国代表团的专机。在港清舱加油等只需一小时左右即可起飞。由中方适时通知香港当局采取安全措施。

蒋介石批准进行的政治谋杀

3月中旬，我情报部门侦悉，由蒋介石亲自批准，台湾“国家安全局局长”郑介民指令所属“保密局局长”毛人凤，策划在香港、印尼暗害周总理。毛人凤即命香港情报站(以下简称港站)负责在香港执行。主管情报工作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李克农立即指示所属尽快探明蒋特的具体计划。

4月初，缅甸总理吴努邀请周总理率中国代表团于4月14日至16日访问仰光，与应邀届时去仰光的印度总理尼赫鲁、埃及总理纳赛尔、阿富汗副首相纳伊姆共商亚非会议有关问题。周总理让我代表团人员到昆明集中。但下列8人因工作需要必须先期到达万隆。他们是：记者黄作梅(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沈建图、杜宏、李平、郝凤格；外交部新闻司干部李肇基；总理办公室工作人员钟步云；外贸部干部石志昂。另有3名外国人亦需先到万隆：奥地利记者严斐德，波兰记者斯塔列茨，越南民主共和国官员王明芳。为此，我有关单位通知印航，4月10日自孟买起飞的星座式客机“克什米尔公主号”照常营业，4月11日到香港后即改为中国代表团的包机迳飞印尼(此外，外交部亚洲司的干部钱嘉栋、林兆南及英文翻译冀朝铸已在4月初从香港乘船去印尼)。

4月7日，刚作完阑尾手术尚未完全康复的周总理乘中国民航伊尔—14飞机离开北京，途经重庆，于8日

抵达昆明。离京前，周总理指示李克农和总理办公室副主任罗青长，继续密切注意香港蒋特动态，及时向他和中央有关领导同志及外交部等有关部门负责人通报。

外交部外交史编辑室编的《新中国外交风云》第二辑（1991年8月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载有史实写的《“克什米尔公主号”空难事件》一文，现先抄录该文的两段：

（1955年）“4月9日晚，外交部办公厅获悉，台湾国民党特务欲破坏我代表团所乘飞机，并备有定时炸弹。与此同时，昆明长途电话传达周总理的紧急指示：要外交部将此情况火速转告香港新华分社和我国代表团，要他们立即向香港当局提出交涉，并请香港当局保证我有关人员的安全；同时指示外交部在北京向英代办进行交涉。”

“办公厅主任董越千当晚将周总理的上述指示转告了香港新华分社和我代表团。次日一上班，又向外交部常务副部长张闻天作了汇报。张闻天副部长随即指示欧非司副司长张越向英国驻华代办处进行交涉。”

4月11日下午，周总理在昆明收到急电：蒋特香港情报站报保密局称，周恩来已不过港，但对其代表团随员的打击，也会影响其在亚非会议上的实力，乃令检理飞机人员按原计划进行，惟因时间仓促，未及将定时炸弹置入油箱，乃绑于油箱底，预计下午4时可望爆炸。

不久，路透社新加坡电称：印度国际航空公司C—69型星座式客机“克什米尔公主号”从香港飞往雅加达途中，在北婆罗洲西北的海面失事，机身坠入海中。机中11位乘客，包括中国政府的工作人员和记者，以及该机8位

机组人员下落不明，恐已全部遇难。

事件发生后，周总理非常愤怒和悲痛，让王倬如打电话问董越千，接到4月9日晚的紧急指示后是如何处理的。董答，他当夜即将总理指示打电话通知香港黄作梅，让黄即告香港当局，保证安全，黄即让分社干部潘德声通知印航驻港办事处。10日上午8时，他报告了张闻天副部长。因英国代办杜维廉去上海未回，10日上午9时半，张越副司长约见英国代办处参赞艾惕思，告以上述内容。

章汉夫、乔冠华向总理建议，请张闻天副部长主持拟定外交部的声明及给英国代办处的照会，指出英国政府和香港当局负有严重责任，必须认真查究，将参与此事的蒋特逮捕。总理表示同意，但要张越再问艾惕思，在他4月10日得到张越通知后，香港当局采取了什么措施。总理特别交代，在外交部声明及给英国代办处的照会中，应如实写出4月10日上午张越对艾惕思的通知内容及艾惕思关于香港所采取措施的答复。在照会中，要香港当局着重查究机场人员。

4月12日下午，新华社发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声明》。声明说：

“参加亚洲非洲会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团工作人员、越南民主共和国代表团工作人员和随同前往采访亚非会议新闻的中外记者共11人，乘坐由我国代表团包用的印度国际航空公司的星座式客机一架，于北京时间4月11日12时一刻自香港起飞，前往雅加达转赴万隆。该机在飞越北婆罗洲沙捞越西北的海面时，爆炸起

火，机身坠入海中，机上全部人员下落不明。

“这一不幸事件绝非一般的飞机失事，而是美国和蒋介石的特务机关蓄意制造的谋杀。早在这批代表团人员和新闻记者启程前，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即已获悉，美国和蒋介石的特务机关正积极布置对我国代表团将要包乘的印度飞机进行破坏，以实现它们暗杀我国以周恩来总理为首的参加亚非会议的代表团人员和破坏亚非会议的阴谋。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在4月10日9时半特将这一情况通知了驻北京的英国代办处，要求英国代办处转告香港英国当局注意，并采取措施以保障上述代表团人员和新闻记者的安全。英国代办处的官员问明了这些人员准备乘坐的客机的所属航空公司后，答应用电报通知香港英国当局。尽管如此，美蒋特务机关的阴谋仍然得逞。英国政府和香港英国当局对这次不幸事件是负有严重责任的。我们要求英国政府和香港英国当局对这一事件进行彻底查究，将参与这一阴谋暗害事件的特务分子逮捕法办，以明责任。”

但因声明中没有说清张越4月10日通知艾惕思的内容及艾惕思关于香港当局所采取的措施的答复，周总理要王倬如即让董越千查告原记录。不久，董越千复电：

一、4月10日张越同艾惕思谈话记录——这里引用上述史实所写《“克什米尔公主号”空难事件》的一段：

“欧非司副司长张越于10日上午9时半紧急约见英国驻华代办处参赞艾惕思，告知中国记者等一行11人明日(11日)上午由香港乘飞机去万隆采访亚非会议，我们

获悉国民党特务将从中进行阻挠和捣乱，故请其转告香港当局注意，并务必对他们的安全予以照顾。艾惕思询问过我代表团有关情况后即表示，他将尽快将这一情况电告香港。还对张越副司长说，以后再有情况，请及时通告，他可随时电告香港。”

二、4月12日外交部声明发表前，艾惕思交给张越一份备忘录，备忘录说：一接到杜维廉的电报，香港总督即安排警察采取适当的预防办法。飞机在香港降落后，警察一直在看守它，没有见到任何未经核准的人进入或接近该机，没有任何企图制造困难的迹象。

后来王倬如告诉我，当时总理非常难过，他说了两点，一是没有及时查询张越同艾惕思的谈话记录；二是没有事先了解外交部声明的内容。

1985年4月24日，为纪念亚非会议召开30周年，《人民日报》在头版刊登并影印了“周恩来同志参加万隆会议前夕写给邓颖超的一封信”，并附有“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者按”和“邓颖超附记”。这封信全文如下：

超：

你的来信收阅。感你的好意和诤言，现将来信捎回，免得失落。有这一次教训，我当更加谨慎，更加努力。文仗如武仗，不能无危险，也不能打无准备的仗，一切当从多方面考虑，经过集体商决而后行。望你放心，再见。

周恩来

一九五五·四·一二

1981年湖南人民出版社翻译出版了飞机失事幸存者卡尼克的《克什米尔公主号》一书。这本书写于1958年，卡尼克在书中讲到，4月11日“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到达香港，他负责检修飞机时，印度航空公司驻香港的一位办事员跑来对他说：“卡尼克，要注意周围的陌生人。你知道中国政府代表团要乘这架飞机，可能有坏人要破坏。”当时卡尼克并未在意。当飞机在空中发生爆炸时，卡尼克才突然想起在香港那位印度航空公司的代表对他作的警告。“一定是什么人在飞机上放了一枚致命的定时炸弹，现在爆炸了。”

不言而喻，香港当局事先必然已得到黄作梅的通知，印航驻香港办事处事先也已得到潘德声的有关通知。

案发后有关各方的态度

一、4月12日印度总理尼赫鲁“对飞机失事事件表示最深切的同情和哀悼。”他说：“这次灾祸有某些十分异乎寻常的特点。在飞机坠入海中之前十分钟，我们还接到了飞机上发来的正常电报。过后不久一定突然发生了什么事。对于这一切必须进行充分的调查。”

4月12日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指责我外交部声明“荒谬”，“没有丝毫根据”，“有一种强烈的宣传动机”。美国参议员曼斯菲尔德说，“如果这一事件涉及破坏行动的话，那大抵是来自共产党中国内部，可能是来自中共党内的分裂分子。”《纽约先驱论坛报》诬称，“中共为了在亚非会

议上引起亚非国家反对美国和英国的情绪而破坏这架飞机并不是不可能的。”

台湾蒋帮官员说，飞机“绝非被人破坏”，“此种推测，荒谬无稽，不值一驳”。“中共的‘破坏’叫声未免太迅速，几乎在飞机还未落海前就大呼‘破坏’。”又诬称，“飞机是中共破坏的，旨在鼓动反美并为‘解放香港’打下基础。”

美联社 4 月 13 日东京电称，一位搭乘“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自孟买到香港的意大利商人皮诺拉抵东京后说，该机在孟买准备起飞时，机长和地勤人员激烈争论后，“宣布这架飞机发生机械故障，不宜飞行”，为了进行修理，延误 4 个半小时。“这架飞机从香港起飞后，可能毛病又发生了。”印航负责人对此严加驳斥，他说“这架飞机在离开孟买时，一切完好无损。截至失事时止，航行没有故障，没有掌握真实就发表据说是一位旅客的谈话，是极不妥当的。”

二、在接到 4 月 11 日“克什米尔公主号”发出的紧急求救的信号后，印尼派出两架飞机进行搜寻，新加坡英国当局亦派出多架飞机及快速护航舰“丹皮尔号”进行搜寻。4 月 12 日晨，在新加坡东北 500 公里处印尼所属的纳土纳群岛的斯达瑙附近发现“克什米尔公主号”残骸。机身坠入离海岸一公里的水中。有 3 位机上人员在一个小岛上被“丹皮尔号”救出，他们是：副驾驶员狄克西特，领航员帕塔克，地勤机械师卡尼克。“丹皮尔号”还找到 3 具尸体，一具是飞行机械师顿哈的，一具是飞行事务员皮门塔的，另一具则无法辨认。

由于飞机失事的地点在印尼领海，按国际民航法规，由印尼组成调查委员会进行调查。调查委员会主席是印尼民用航空局空运处处长伊马汪。印尼和英国船只打捞飞机残骸。

三、4月13日晨6时，外交部副部长张闻天召见英国代办杜维廉，宣读并面交一份照会。杜维廉对照会中所说“英国政府和香港当局对这次不幸事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提出抗议，声称尚未确定飞机失事的原因，应该等待调查的结果。他还说，4月10日张越通知艾惕思时只讲到可能会有人捣乱，而未说有人企图进行破坏，但香港当局仍然采取了充分的预防措施。他要求中方提供所掌握的详细证据。

张闻天指出：英方的抗议我们不能接受，我们的指责是有充分理由的。香港当局知道机场上有美蒋特务在活动，从那里可以找到足够的证据。英国政府和香港政府首先得有决心。有了决心去查究，此案是不难弄清的。

同日上午，外交部副部长姬鹏飞约见印度大使赖嘉文时说，香港机场地勤人员中就有美蒋特务，非常可能在机内放了定时炸弹。

4月13日下午，艾惕思将香港总督在当天下午1时15分对报界发表的声明函送张越，声明说：“香港政府于上周末接到英国代办处的一封电报说，中国外交部曾经得到情报说，中国国民党同情分子可能对搭乘印度航空公司即将离开香港飞赴万隆会议的一批记者进行捣乱，请香港政府采取适当的预防办法。”

声明说：“在 4 月 11 日即星期一上午，新华社有一位代表打电话通知高级警官说，11 名记者及一名越盟代表即将于该日下午搭乘一架印度航空公司飞机启程离开香港。”“该新华社代表当日及此后一点也没有提到怀疑有人捣乱。”香港政府“仍按照北京代办处的电报采取了行动”。

声明的第二段欲盖弥彰。第一，如上所述，董越千在 4 月 9 日夜应即将周总理的紧急指示打电话通知黄作梅，香港“新华社的代表”绝不会在 4 月 11 日上午才通知港方。第二，如果“一点也没有提到怀疑有人捣乱”，香港“新华社的代表”为何要打电话给“高级警官”？第三，乘坐“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的是 11 人。香港新华社作为接待单位，知道他们的国籍和职务。怎么会通知“高级警官”说“11 名记者及一名越盟代表”要乘印航飞机离开香港？怎么会把 11 人说成 12 人？

四、4 月 17 日，印度国际航空公司在孟买发表了“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坠毁事件的声明。声明说，据 3 位生还的乘务人员提出的报告，使飞机失事的爆炸和起火是“由于同飞机本身的构造完全无关的外来原因造成的。”

“截至爆炸和起火时止，飞机在各方面都飞行得很正常，”声明说，“这次悲剧的确切原因必须由正式调查委员会在详细检查飞机残骸后肯定。”

五、4 月 17 日，英国代办处送给我外交部一份“备忘录”，作为我外交部 4 月 13 日给英国代办处的照会的答复。